

吴真：“书厄”中，郑振铎的文化抗战

文/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 李娇娇
图/受访者提供

举国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吴真的新著《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以下简称《暗斗》）于今年7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正式出版。该书打通书籍史与抗战史，借助日藏档案、日记、回忆录、题跋赠语、书店账目等多元文献，再现了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开明文人圈”等留守上海的文化志士，在多方势力交织下抢救民族文献的“救书之路”。

近日，吴真在直播中向读者分享了自己长达15年的文献追踪经历与创作心路，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已出版《勘破狐狸窟：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等。

记述“书厄”冰山一角

羊城晚报：您最近出版的《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一书的写作缘起是什么？

吴真：2009年我在日本做博士后研究，有一天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叫《广东战后报告》，里面提到1938年底广东各大学图书遭到劫掠的情况，日本方派了东北帝国大学、台北帝国大学两位教授来广州整理这批图书。这一细节引起我极大的好奇心，我试图找到母校中山大学当年这批遭劫图书的下落。后来的十五年间，我每次到日本访学，一边从事古代戏曲文献的专业研究，一边追查中国被劫图书的相关资料。

在这过程中，我的目光聚集到了郑振铎的身上。我发现，立足于丰富的档案史料，郑振铎与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抗战时期保存、抢救图书的秘密工作，可以连贯成为一条完整的时间叙事线。幸运的是，他们1941年在上海“书厄”中抢救并转移至香港、后来遭日军劫掠到日本东京的一批珍贵古籍，在1947年被成功追讨了回来。当时中国更多被劫掠的图书，至今仍杳无音讯。我想，中国被劫图书的追查工作要从哪里做起？可能还是得从冰山上浮现出来的一角，也就是从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的工作做起，去想象沉在海底的大部分图书的情况：它们漂泊于何方，何时归家？

羊城晚报：您在书中提出了“抗战书厄”这一概念，怎么理解？

吴真：“书厄”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书籍大量亡佚残缺的劫难。持续十四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国究竟损失了多少书籍？战前中国共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达2166所之多，损失图书接近九千万册。而这只是图书馆系统截至1937年底的官方数据，不在统计范围的、遍布全国的民

间私人藏书更是遭遇了灭顶之灾。因此一直到1945年8月的抗战胜利，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图书馆界一直没有一个中国战时公家与私人损失图书的数字统计，但可以想象，这一定是天文数字。

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还成立了“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的文化资料。江南地区的私人藏书楼，更是受到了日伪军队的洗劫。当江南故家的劫余古籍源源不断流入上海，成为日伪势力追逐的重点目标，郑振铎挺身而出，将“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视为一个文化传承保存者的使命。《暗斗》按照纪年的方式，一年就是一章，逐年记述郑振铎的文化保卫历程。

为学问藏书，为古书“续命”

羊城晚报：作为一名古典戏曲研究学者，您如何看待郑振铎的学术地位？

吴真：郑振铎是一个文化多面手和社会活动家，他不仅撰写了第一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更以《中国俗文学史》奠定了俗文学研究的基石。但他在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影响力，似乎还不及他的同行吴梅、孙楷第。从学术史的视野来看，我觉得他是一个平均分比较高、但单科成绩不算高的研究者。他虽然著述颇丰，但没有一篇鼎定天下的名篇。

我觉得这是他作为文人一种随性的表现，他早年的兴趣在外国文学，是泰戈尔《飞鸟集》的最早翻译者，1931年从编辑转行到大学教授，就转入古代文学尤其是戏曲说唱文学的研究，并且为了研究而大力搜罗俗文学文献，于是渐渐地变成一名藏书家。他并未刻意划定学术蓝图，而是始终追随个人的研究兴趣与文化使命而行。在引领民国学术界的戏曲研究热潮中，他学术嗅觉敏锐，最早将一类敦煌文学命名为“变文”，也最早对《刘知远诸宫调》等等

新见文献进行学术研究，并且他的文章论述精到，是那个时代最具活力的杰出学者之一。

羊城晚报：您在后记中写道：“一个人与一群人以及一个时代”，为什么选择郑振铎作为解开现代文人文化抗战的“引子”？

吴真：当郑振铎作为具体的人，透过他，我们可以很好地看到他身后的那批人，以及他们所处的时代。首先，郑振铎似乎知道他自己将来会进入历史，所以笔头特别勤，留下了大量书写当下事件、心情的日记、题跋等。其次，郑振铎是第一个以连载的方式完整回忆全面抗战8年的现代当代文学家。1945年底，他率先在《大公报》《时代周报》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近20篇散文，记录他蛰居上海期间的所见所闻，后来这些散文结集为《蛰居散记》。比如在《“废纸”劫》中，他详细记录了1942年在日本恐怖统治下，上海人人自我审查，家家烧书、撕书、卖书的文化劫难。所以说，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抗战留下了非常多的字，在每个时代的当口，都留下了他的痕迹。

羊城晚报：郑振铎收购图书具有怎样的取向？

吴真：在我看来，郑振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是为了学问而藏书。他个人的收藏重点一直放在戏曲刊本和弹词、鼓词、宝卷等唱本以及木刻版画，这些都是为其学术研究服务。在为中央图书馆收购嘉业堂藏书的过程中，郑振铎以超越传统藏书家的现代学术眼光，舍弃收藏价值更高的宋元精本，而独取“有用与罕见”的明初刊本。正如他自己所说：“我辈收书，不重外表，不重古董，亦不在饰架壮观，惟以实用及保存文化为主。”郑振铎和他同时代的学者们，实则开启了图书收藏的另一种风气：他们致力于搜罗古籍善本，加以深入研究，并将其影印出版，化身万千，为古书“续命”。郑振铎一直将他的个人兴趣、学术研究和守卫书籍文明的共同事业结合得很好。

下一步研究 广东抗战被劫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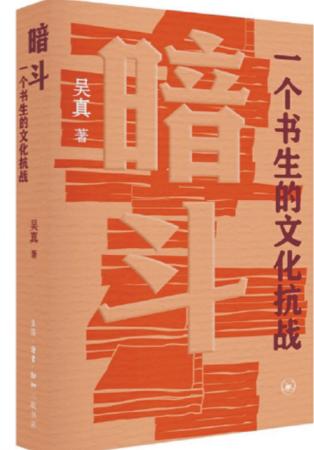
羊城晚报：抗战时期，中山大学的图书劫失情况如何？

吴真：作为抗战时期华南地区的“抗日大本营”，中山大学直到1938年10月19日才撤离，两天后，日军就攻陷了广州。在仓促撤离的过程中，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杜定友组织馆员尽力抢救较为贵重且有价值的图书，这一部分图书随学校北迁，另有一部分寄存于沙面租界、香港九龙等地，但余下的图书、机械、仪器、标本及其他校产，留在中山大学石牌校区，到1945年抗战胜利重新清点时，已经了无所剩。张世泰在《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一文中说，中山大学撤退前遗留图书十六万册，抗战胜利后，校方经过查访各个敌伪单位，仅收回二万余册。

1938年底，以杜定友为首的中大图书馆人押运守卫着大批文献资料，6年10个多月经过广东、广西、贵州、云南、香港、越南、湖南等地，一次又一次冒着敌人的炮火，舍命守卫图书馆。这一功绩，丝毫不逊于上海的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我这十几年的研究也涉及中山大学、岭南大学以及两广地质调查所的战时被劫图籍。我发现广东的被劫图书，和文献保存同志会1941年在上海抢救的古籍一样，经过“香港→东京”运输路线，被劫往日本。这次在《暗斗》一书中，我还没有余力对于广东被劫图籍进行专题研究，这将是我下一步的研究方向。

羊城晚报：面对海量的文献，您认为做好学术研究的同时，应如何讲好故事？

吴真：读唐长孺、田余庆等史学大家的论著，就能体会到，学术研究与讲故事之间并不矛盾。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有意借鉴法国年鉴学派的方



法，让历史的细节自己说话。书中虽然运用了大量不同性质的史料文献，但是我始终努力先理清不同文献的叙事目的和叙事边界，然后在表述时，尽可能地还原具体的历史场景与生动的时代细节。这些史料文献就像火山的岩浆，它在当年怎样地炽热，最后凝固下来。作为研究者，我们要有能力通过这块已经冷却、黑乎乎的岩石，去想象它火山爆发时的热烈汹涌。我在写作的过程中，一直进行着这样的合理想象。

当然，在选择语体时也有过一番的挣扎，是选择看起来更有学问的“论文体”呢，还是选择郑振铎这一代开创的白话散文体？最后我决定不管用什么语体，只要能够把我搜集的中文和日语文献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互文性”充分地表现出来，那就是最适合的语体。

羊城晚报：研究郑振铎文化抗战的历程时，您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您最终希望向当代读者传递怎样的精神？

吴真：我首先关注的是家国命运、个体命运与书籍命运在战争时代产生的怎样的共振。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通过他记录的书籍的流散，我们可以窥见战争中的个人与国家的命运。“以书为矛，以商为盾”的郑振铎是本书的主角，同时我也希望呈现出郑振铎身后的众多坚持“文化抗战”的同盟者群像。尤其是在纸质书已经与我们当下生活渐行渐远的今天，重温80年前的这一场“文化抗战”，或许能够提醒我们，书籍作为一种武器，可以用来摧毁，可以用来自抵抗，也可以滋润万物。

鲁迅风度及吸烟与酒及茶之关系

□萧振鸣

鲁迅又“躺枪”了

伴随一生的吸烟之癖

最近鲁迅又“躺枪”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前的鲁迅抽烟画像被投诉，引起广泛关注。鲁迅“躺枪”无数，生前身后，多了去了。这种投诉连笑柄都算不上，之所以成为热点，是人们正好借此抒发胸中块垒，说明阿Q并未断子绝孙。

鲁迅离世至今已有89年，但专业的或非专业的研究者仍在谈论鲁迅的文字，鲁迅还在被纪念，被研究，甚至被攻击，总之是还没有“逃亡”。他还在那里抽烟，正如萧红在回忆中所言——鲁迅先生坐在那儿，像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上海时见到鲁迅说：“都说你是中国的高尔基，但我觉得你比高尔基漂亮。”鲁迅幽默地答道：“我老了会更漂亮。”的确，在新文化人士中，鲁迅是少有的风度翩翩并且自信满满。

鲁迅以倡导版画而成为“美术中人”，鲁迅之后的美术家，特别是版画家、油画家、雕塑家，几乎都创作过鲁迅的形象。但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又各有不同，染着时代的痕迹。版画中的鲁迅形象特别多，横眉的，竖目的，拿笔的，拿枪的，微笑的，思考的，百态千姿，因为他是中国现代版画的倡导者、先驱者。

鲁迅吸烟的美术形象非常之多，北京鲁迅博物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等都收藏或展示有鲁迅吸烟造型的美术作品。这种造型已成为大众心中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这幅版画，是著名的版画家李以泰先生的代表作，作于1974年。几十年来，这幅名作已深入人心。

出的，我不劝别人牺牲什么之类者就为此。欧战的时候，最重‘壕堑战’，战士伏在壕中，有时吸烟，也唱歌，打纸牌，喝酒，也在壕内开美术展览会，但有时忽向敌人开他几枪。”

对于戒烟的事，鲁迅曾在写给许钦文的信中说：“医生禁喝酒，那倒没有什么；禁劳作，但还只得做一点；禁吸烟，则苦极矣，我觉得如此，倒还不如生病。”鲁迅去世前十天，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当时由摄影记者拍下一组照片，虽然面色憔悴却精神矍铄，与木刻青年侃侃而谈，那手中，始终夹着香烟。鲁迅直到去世前一天，手里还拿着香烟。鲁迅死于肺炎，鲁迅的肺病一定是与吸烟有关的。吸烟之癖，伴随着鲁迅一生。

鲁迅在北京和上海的酒局很多，但由于胃病与肺病的困扰，在喝酒方面鲁迅也是注意节制的。亲朋好友访鲁迅时多会带酒给他，酒的品种他不太讲究，白干酒、五加皮、汾酒等烈性酒他都喝过，白玫瑰、白兰地、威士忌酒、苦南酒、薄荷酒、玫瑰葡萄酒、白葡萄酒、啤酒他都喝，而喝得最多的，还是家乡绍兴的黄酒。

鲁迅很懂得饮酒历史和饮酒的情趣。他曾说：“李白会做诗，就可以不责其喝酒，如果只会喝酒，便以半个李白，或李白的徒弟孙自命，那可是应该赶紧将他‘排绝’的。”(《招贴即扯》)正如鲁迅会做诗、小说、散文、杂文，人们并不在意他的喝酒，倘若他只是会喝酒，也就不会成为鲁迅。在鲁迅留给世人的文字中，常常是以酒来作为佐料。

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孔乙己》《阿Q正传》《孤独者》等，其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围绕喝酒来展开的，而在鲁迅的笔下，对酒馆场景的熟悉，对喝酒人物的刻画，无不入木三分，这与鲁迅的饮酒体验是分不开的。

他的杂文中很多有关酒的话题，《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看出他对酒颇有研究。鲁迅所作旧体诗，也常有关于酒的描述如：“把酒论天下，先生小人。大圆犹酩酊，微醉合沉沦。”(《哭范爱农》)“岁暮何堪再惆怅，且持卮酒食河豚。”(《无题·其一》)“无端旧梦驱残醉，独对灯阴忆子规。”(《无题·其二》)等等。

深谙茶道的茶夫子

1924年时，高长虹与鲁迅交往密切，他回忆说：“烟、酒、茶三种习惯，鲁迅都有，而且很深。”

鲁迅，是一位深谙茶道的茶夫子。



鲁迅(版画)

□李以泰

鲁迅有篇散文《喝茶》，文中说：“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盖碗，又称“三才碗”，盖为天、托为地、碗为人，即天地人三才之意。在北京鲁迅旧居的书桌上，还陈列着鲁迅用过的清代的盖碗。

鲁迅之于茶道，本是个行家。在他13岁时，家道变故，就在那时，便养成了抄书的习惯，曾经把陆羽的三卷《茶经》抄录一过。对产茶、制茶、泡茶、品茶的学问都有认识。

鲁迅爱喝茶而且是懂得品茶之道的。有一次一个茶叶公司打折售茶，他用二角大洋买来两两好茶叶。回家就泡了一壶，怕它冷得快，就用棉袄包起来，却不料郑重其事地品茶时，那颜色很重浊，味道也竟和他一向喝的粗茶差不多。鲁迅立刻感到是自己错了——喝好茶一定要用盖碗的——于是改用盖碗重新泡。“果然，泡了之后，色清而味甘，微香而小苦，确是好茶叶。”(《喝茶》)

鲁迅熟知泡茶之法，并告诉读者“色清”“味甘”“微香”“小苦”是好茶叶的标志。鲁迅买了好茶，想精心品尝，却因为写作分心，错过了品茶的最佳时间，“那好味道竟又不知不觉的滑过去，

像喝着粗茶一样了。”于是他得出结论：“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不过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感觉。”鲁迅的高格，在于这后面的联想：“由这一极琐屑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风雨阴晴，都给他一种刺戟，一方面也就是一种‘清福’，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时，就要割稻而已。”鲁迅写的是喝茶，但说的是茶外的话，讽刺和剖析了所谓骚人墨客。

鲁迅以文章名世，笔锋犀利，直击灵魂，是向旧世界冲锋陷阵的英雄。作为血肉之躯的鲁迅，既是侠肝义胆、无畏战斗的勇士，也是热爱生活的平民。1933年秋，鲁迅曾作《百年秋之偶成》一首赠友人：“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蒲。”关于此诗，有不同诠释，笔者不论，每逢读诵此诗，都能感受到鲁迅的达观与幽远。